



情报杂志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ISSN 1002-1965, CN 61-1167/G3

《情报杂志》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伊朗情报体系结构与困境分析
作者： 王国兵
网络首发日期： 2022-05-05
引用格式： 王国兵. 伊朗情报体系结构与困境分析[J/OL]. 情报杂志.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61.1167.G3.20220429.1606.025.html>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伊朗情报体系结构与困境分析*

王国兵^{1,2}

(1. 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暨南亚研究中心 西安 710128;
2. 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 重庆 400715)

摘要:[研究目的]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降,伊朗积极打造本国独具特色的情报系统。其情报结构框架清晰,多部门共同协调搜集情报,在反情报系统建设方面也卓有成效,发挥了捍卫政权稳固的重要作用。总结其建设成为中东地区情报大国的方法和路径,可为我国情报事业发展提供更多有益借鉴。[研究方法]从伊朗情报机构的发展演变入手,分析其组织内部架构和特点,归纳情报系统的发展困境,并探索其解决路径。[研究结论]通过长期建设,伊朗已大幅提升情报组织的效能,不断优化情报力量,积极建构良性情报文化,抵御了来自内外方向各类威胁。尽管仍有诸多因素限制其发展,但伊朗已成为中东地区的情报大国,值得镜鉴。

关键词:情报系统;情报体系结构;情报组织;反情报;伊朗

中图分类号:G359

Analysis of Iran's Intelligence Architecture and Dilemma

Wang Guobing^{1,2}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enter for South Asian Studies,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2. Iranian Studies Center,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Research purpose] Since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1979, Iran has actively built its own unique intelligence system. Iran's intelligence structure has a clear framework, with multiple departments coordinating and collecting intelligence. It has also been effective in building counterintelligence system,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defend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regime. Summarizing the methods and paths of building Iran into a major intelligence country in the Middle East can provide more useful experi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lligence work. [Research method] Starting from the evolu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Iranian intelligence agencies, this study analyzes its internal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of the intelligence system, and explores its solutions. [Research conclusion] Through long-term construction, Iran has greatly improved the effectiveness of its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 continuously optimized its intelligence strength, actively built a benign intelligence culture, and resisted various threats from both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Although there are still many factors restricting its development, Iran has become an intelligence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which is worth drawing a lesson.

Key words: intelligence system; intelligence system architecture;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 counterintelligence; Iran

伊朗情报系统在中东国家中极具特色,为巩固伊朗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以来,美国与伊朗断交至今已有四十三年。众所周知,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伊朗伊斯兰政权保持敌视和遏制态度,除派出情报人员赴伊境内秘密搜集情报外,还支持该国境内各类反政府组织,谋求颠覆伊朗现

政权的目標。以色列和沙特等國情报組織也對伊朗境內多個重要軍事設施密切關注,對伊朗國家安全構成了潛在威脅。近年來,伊朗內部同樣面臨着不同種類 的社會治理危機,民眾街頭騷亂時有發生,對政權穩定 產生了不利影響。如2009年“綠色運動”和2018年初 “十月風波”暴露出該國內部治理體系存在諸多隱患。

基金項目:陝西省教育廳專項科研計劃項目“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展流變研究”(21JK0308)階段性成果;并獲西安外國語大學科研基金項目資助(20XWE04)。

作者簡介:王國兵,男,1989年,博士,講師,研究方向:伊朗情报系統與軍政關係。

由上述情况看,伊朗本国安全环境难言乐观,该国情报体系依然面临挑战与困难。但从现实结果来分析,伊朗却保持了四十余年政权稳定之局面,社会内部出现的多次动乱也最终被平抑。个中理由显然值得反思探讨!毫无疑问,该国的情报体系为捍卫伊朗政权稳固贡献了重要力量。因此,有必要对该国的情报体系展开进一步研究考察,了解其内部组织架构和运行逻辑,评估其发展困境,为我国情报体系建设提供更多镜鉴。

1 伊朗国家现代情报体系的发展历程

从发展渊源看,伊朗情报体系起源于20世纪中叶美苏冷战之际。当时,巴列维国王统治下的伊朗与英美等西方大国关系较为紧密,在战争阴霾笼罩下进一步促使伊朗现代化意义的情报体系得以产生。1955年11月,伊朗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之后,美国对伊朗军事援助开始增多,伊朗也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地区性盟友。1957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共同协助下,伊朗成立了本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情报组织——萨瓦克(SAVAK)。该组织主要任务是负责秘密搜集情报并开展反情报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萨瓦克工作任务有所调整,重点负责调查伊朗社会内部反政府的政治团体。如图德党(Tudeh Party)和各类“反政府自由派人士”皆在其监控范围之内。20世纪70年代初,萨瓦克组织规模进一步扩大,雇员人数就达到6万余名,其中情报搜集专员人数达到5.5万名。总之,作为捍卫巴列维王朝统治的重要工具,萨瓦克功不可没^[1]。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巴列维王朝彻底覆灭,伊朗进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时期。萨瓦克组织的发展命运随之发生转折。最高领袖霍梅尼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援助下,创建了伊朗伊斯兰政权统治下的第一个情报组织——萨瓦玛(SAVAMA,萨瓦克是该组织的前身)。以霍梅尼为首的伊朗统治精英群体对巴列维国王遗留下的萨瓦克进行大幅整顿“清洗”,除部分人员重新编入到萨瓦玛外,大部分人员均被政府遣散^[2]。1984年,伊朗情报信息部在萨瓦玛基础上正式成立,伊朗国家情报体系逐渐进入发展的快车道,机制进一步健全^[2]。伴随伊朗外部安全环境的恶化,伊朗与苏联的关系得以改善。上世纪80年代,苏联为伊朗情报体系发展提供了诸多帮助,为伊朗情报系统发展贡献了重要作用。如苏联对外情报局曾为伊朗训练数百名情报人员,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培养了第一批情报人才。其中,著名的苏联情报专家叶甫根尼·普里马科夫(Yevgeny Primakov)更是为伊朗情报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他帮助该国情报人员学习了克格勃的情报信息传递技术和反情报技巧,获得最高领袖霍梅尼的

嘉奖。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意识到国防军(波斯语“Artesh”,意为军队,国内学界也称正规军)^[1]下属情报网络存在工作效率低下的弊病,下定决心创建一支新的情报力量。因此,授意伊斯兰革命卫队开始组建情报组织。1996年,伊朗最高情报事务委员会创建,其规模在上世纪末达到顶峰,其下辖12个部门,雇员人数达到2万余众。促进该国情报事业进一步向前发展^[2]。

进入21世纪以后,伊朗情报力量迅速壮大,逐渐建立起一套特色鲜明、卓有成效的情报体系,为捍卫伊朗国家安全发挥重要作用。纵观伊朗情报系统的发展历程,曾得到美国、以色列、苏联等世界情报大国的指导,获取了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1979年之后,该国情报系统又饱受来自美国、以色列等国情报组织的考验。与此同时,伊朗还能不断扩大其在中东地区的地区影响力,可见其情报工作已日益成熟。

2 伊朗情报体系结构

整体来看,伊朗情报体系结构十分严密且布局合理。各部门机构不仅分工明确,下属部门还可各司其职,能够迅速有效地将搜集到的情报信息进行专业分析后上报给决策层,对于捍卫政权稳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2.1 多部门共同协调的情报结构体系

从伊朗情报体系权力架构分析,宗教界大阿亚图拉(伊斯兰教什叶派内最高阶教士名称)哈梅内伊既是该国宗教界最高领袖也是该国最高政治权力的实际掌握者,更是伊朗情报体系的最高负责人。最高领袖统筹规划制定国家安全策略。在此前提之下,伊朗国内一切体制都是围绕捍卫伊斯兰政权稳固这个目标而展开。

在最高领袖之下的情报机关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它发挥着伊朗情报机构的中枢决策作用^[3]。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89年伊朗宪法修订期间成立,取代了之前的伊朗最高国防委员会,逐步占据伊朗情报工作的核心位置。尽管伊朗总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名义负责人,但实际工作却掌握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手中。秘书长人选需要在最高领袖同意(或默许授意,视情况而定)下任命。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通常负责这个部门的日常运营与维护工作。该机构主要使命是维护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基本精神、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家安全委员会共有12名正式成员组成(其他临时成员根据议程可能会被邀请)。包括总统、议长、司法总监、外交部长、内政部长、情报安全部长、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国防军司令、革命卫队司令、计划与预算组织主席以及最高领袖任命的两名代表。总统作为委员会的名义主席,委员会下设一名秘书,通常

报的作用。近年来,该支部队在应对伊朗国内社会骚乱方面的经验也逐渐丰富。2009年伊朗“绿色运动”后该部队又成立“情报和公共安全警察”支队,主要运用各类侦查识别手段逮捕可疑人员并收集基层情报。此外,执法警察力量还在该国建立“线人网络”,主要收集民众的日常言论,以排除各类潜在的危险因素。

综上可知,武装力量在伊朗情报系统中的分量显然较高。这首先与情报工作的特殊属性有关,同时也与伊朗政治精英集团的个性偏好存在密切关系。情报工作本身就有一定危险性,这就决定了其情报搜集工作更加需要依赖军队、警察这类暴力执法力量。此外,以伊斯兰革命卫队为首的情报力量久经考验又能屡立功勋,进一步获得了以最高领袖为首的教士集团信任。

2.3 等级界限明晰的组织架构 在伊朗情报体系中,上下级等级隶属观念十分明显,组织架构等级化的特征较为突出。无论是军事情报力量还是隶属于行政机关的情报安全部,其内部组织结构等级都非常严格。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反映了伊朗政治文化中的等级性特质(伊朗社会等级意味较为明显,无论是在琐罗亚斯德教或什叶派教义中均有体现,低等级的成员遇到高等级的成员时需略微鞠躬表示尊重)^[9]。作为伊朗伊斯兰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朗各类情报机构同样也需要贯彻垂直化的管理模式运行。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例,其日常召开的会议可分为四个等级。从低到高分别是:外交部领导与原子能机构负责人主持下的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内召开的专家会议;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领导下召开的部长级委员会,称为最高核委员会(商讨核问题);最高级别,包括“统治系统的所有首脑”,重大决议都是在此级别会议进行商讨决策(最高领袖一定到场)^[10]。这种组织结构呈现等级化的特点还在革命卫队和国防军等武装力量中也有所体现。以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巴斯基民兵为例,其主要职责是捍卫伊朗社会稳定并搜集伊朗社会内部不同层面的各类情报。巴斯基民兵从最低等级到最高等级分别为潜力巴斯基、常规巴斯基、积极巴斯基、骨干巴斯基和特殊巴斯基。(见图2)前三个等级的巴斯基人数较多,主要以青年学生构成。后两个等级为巴斯基民兵组织中的正式成员,人数相对较少,主要负责城镇地区的情报和哨卡执勤等任务^[11]。这种组织结构特点不仅在巴斯基民兵组织体现,革命卫队和国防军其他武装力量分支均是如此。显然,行政机构的情报组织和军事武装力量情报组织的等级化结构特质是世界各国情报组织的共同特征。这种按照等级管理的方式对实现积极的管理绩效有积极的正面效果,能够彻底地贯彻执行最高统治者的意志。然而,这种等级化和差异化的管理模式也会导致

组织系统内部不同等级的成员间容易产生疏离感与不信任感,影响情报机构的效能发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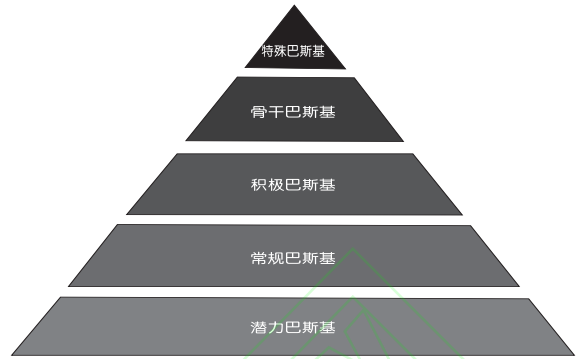


图2 巴斯基成员等级结构图

3 伊朗情报体系的发展困境

通过四十余年建设,伊朗情报体系结构已日渐完整,相较于其他中东大多数国家的情报体系,具有绝对优势。在情报管理方面,伊朗已建立起一个有限协调型的情报管理体制。尽管这个情报体制存在结构失衡的弊端。从情报搜集能力看,伊朗情报搜集范围也由本国范围逐渐向国外乃至亚非拉等地区扩展,情报信息来源渠道尽管有所拓宽,但却存在能力相对不足的问题。尽管伊朗在反情报系统方面与应对国内外极端主义势力方面均取得不少进步,但受制于本国国情,伊朗反情报系统工作仍存在突出短板,其与美国、俄罗斯、以色列等世界级情报强国相比仍有差距,亟待改进。

3.1 伊斯兰革命卫队话语权畸高 当下,伊朗情报体系受伊斯兰革命卫队影响较大。从当下伊朗国家情报体系决策人物构成背景看,大部分决策者或多或少都与革命卫队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圣城旅司令卡尼、革命卫队前成员雷扎伊、恰里巴夫等人皆有革命卫队的出身背景。他们牢牢占据了伊朗国家安全事务的核心位置^[3]。伴随军事力量在情报工作中话语权的提高,革命卫队的影响也日益提高,伊朗政府下属的情报安全部声音日渐降低,导致两支情报力量间的矛盾逐渐增多,嫌隙陡增。如2017年2月24日,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情报部队逮捕15名涉嫌危害伊朗国家安全嫌疑犯后,引发伊朗情报与安全部的强烈不满。情报安全部发言人侯赛因·内贾特(Housseij Nejat)认为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行为“严重越界,非常危险”^[14]。当下,两大部门之间的竞争关系日趋激烈和白热化,也缺乏相应机制体系居中协调机制。长此以往,伊朗情报系统的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影响。此外,具体到情报分析方面,最高领袖的个人好恶因素又往往发挥关键性作用,导致各类匪夷所思的事件发生。如2019年初伊朗首都德黑兰城郊附近出现乌克兰民航客机意外坠机

事件。经查后发现是革命卫队判断失误,发射导弹击落导致的惨剧。伊朗政府在调查该事故原因过程中又遭遇革命卫队的重重阻拦与限制,调查进程非常艰难。最终,经过最高领袖的授意下才将事故原因彻底查明。

毫无疑问,革命卫队在情报体系拥有过大的话语权易致国家资源过分向军队方倾斜,损害其他伊朗情报机构的积极性,不利于情报界良性持久发展。当下,以英美为代表的国家情报强国均在发展协调型的情报管理体制,伊朗作为中东地区的情报大国,其情报体系的协调程度有待提高。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可以直接指导情报机构的情报搜集工作并分析其活动,进而评估其表现。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可从人事任命、预算分配等方面对情报机构施加影响,并通过任务主管控制各机构的日常工作。相比之下,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总统看似占据情报事务的领导核心地位,但却均不具备管理情报机构活动的实际权力,仅有执行与建议权力。最高领袖作为宗教领袖居于领导核心地位,却非常缺乏专业的情报分析和评估能力,专业能力不强。其作出的决策往往不够客观、科学、中立。伊朗情报安全部尽管名义上归属伊朗政府,但总统并无决策权,只有把重要情报向最高领袖汇报。究其根本,伊朗伊斯兰政权下的一切体制均围绕“法基赫监护制度”展开,最高领袖制度的存在更体现了伊朗教法学家治国的基本政治准则。因此,伊朗情报体制自然也会以最高领袖意志为转移,缺乏法治理念和相应的法律机制,未能构建如英美等国这类的协调型情报体制。因此,伊朗的情报机构和情报分析机制仍有很大进步空间。

3.2 反情报能力有待提高 通常来说,“反情报是指收集信息以及开展的活动防止间谍和其他情报活动。反情报可被视为一门分析学科,其基本目标就是对抗外国情报部门的活动。该目标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实现,包括欺骗、渗透敌对服务、自查内部系统潜在威胁等各类手段。”^[15]单就反情报系统而言,伊朗反情报系统的技术能力和人力资源方面均有不小缺陷,面临情报外逃人员的风险也较大。

3.2.1 反情报系统的技术能力欠佳 整体而言,伊朗反情报系技术能力相较于美国和以色列等世界反情报大国差距十分明显。在技术情报搜集领域,伊朗侦察卫星总体技术能力相对有限,尽管具备一定图像侦察能力,但相比以色列以图像、电子、导弹预警及核爆炸探测卫星构成的立体式侦察情报搜集体系仍有较大距离。不过,在网络虚拟世界中,伊朗凭借相对落后的技术设备组建了网络情报防御部队,也取得了不俗成绩。2009年伊朗“绿色运动”后,伊朗进一步扩大了在网络平台的监控力度,减小西方媒体凭借互联网技

术的优势对伊朗国家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16]。2012年,在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主张下,伊朗组建最高网络空间委员会,与政府共同努力保护伊朗的网络安全,防止各类影响社会安定的活动发生。长远来看,伊朗反情报工作面临的挑战来自虚拟和真实两个维度,在网络平台里同样需要卓越的反情报技术能力应对。这个虚拟空间中需要强大的人工智能技术和数字科技,而这恰恰是伊朗反情报系统的不足之处。同时,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发展程度都有所欠缺。面临西方发达国家凭借信息技术优势下发动的各类情报战,“法基赫监护”体制下的伊朗其实很难完成这项艰巨任务^[17]。

3.2.2 反情报系统面临内部人员叛逃风险逐渐增大 近年来,伊朗反情报系统错漏频出,内部人员失职渎职情况引发高层官员的震怒,影响政权稳固。如1996年伊朗情报组织重要成员前往德国居留,造成伊朗情报系统内部大震荡。2020年,先后发生“苏莱曼尼被刺事件”和“核物理学家莫森·法赫里扎德遇害案”两起危害伊朗国家安全的恶性事件更是引发外界关注。随后,11月30日,伊朗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沙赫丹也在伊拉克与叙利亚边境被无人机袭击身亡。有内部消息显示,这些危害伊朗国家安全的恶性事件背后都与本国内部情报人员叛变存在直接关系。

从反情报体系建设结果看,伊朗眼下需要着重展开情报搜集人员的防间保密工作,加强对内部情报搜集人员的背景审查等工作。从本质出发,这一现象的背后与伊朗近年来日益凋敝的民生状况存在密切关系。同样也与美国制裁加剧、新冠疫情爆发等多种复杂不确定性因素有关。再加之,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与AI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反情报技术领域日新月异,以伊朗目前的技术发展水平已无法完全适应^[18]。近年来,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伊朗受到经济制裁压力也愈加增大,改善民生的动力更是缺乏。可以确定,如若伊朗政权不能解决政权的有效性危机,容易出现政治失衡等各类状况。

3.3 行政体制对伊朗情报工作的负面影响 组织理论学者认为,“作为一种固定规律而言,组织的规模越大、越复杂,它面临的约束条件的范围越大,种类也就会越多。”^[19]伊朗情报体系内部组织结构较为复杂,面临的困难阻碍也十分繁多,不可避免地存在组织结构功能属性重叠的弊端。情报组织作为该国行政机构,其运行机制也深受政治体制影响。此外,伊朗情报体系始终受到非正式情报成员的无形影响,导致情报体系发展和决策总会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干扰。特别是伊朗国内高级教士和利益集团代表往往能够在情报分析和决策过程中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作为非制

度性的行动者能够凭借政治家族关系网络和权力重叠产生的权力空间进行干预。这种复杂性是伊朗政治文化的独特所在,也被强调精英共识的政治文化所平衡,导致决策结果并不科学和严谨。在伊朗情报体系中,反而会出现各类意料之外的结果。再加之,伊朗政治文化独有的“权宜之计”原则(波斯语音译为“Mashalat”,具有讨价还价最终和解的意思)也在不断建构并影响这一过程。在伊朗统治精英群体看来,这意味着必须以政权生存原则进行各方势力的妥协和平衡。因此,伊朗情报分析或许很科学,但决策过程的结果总是各种利益集团和政治团体相互平衡的妥协结果^[18]。例如,在调查2020年1月伊朗德黑兰郊外“乌克兰坠机事件”过程中,伊斯兰革命卫队散布各类“烟雾弹”对调查工作人员掩盖事件发生的真实原因。在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大力干预下才得以让事故原因真相大白。事故原因竟然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信息有误,误将乌克兰客机当做敌机击落,导致100余名乘客意外丧生,造成重大事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情报部队实力也愈加增强,其功能与圣城旅的功能存在高度重合的弊病,耗费了国家资源,降低了情报搜集与情报分析效率。这也是伊朗行政机构的一贯作风,实行双重机构并立,以造成互相制约的效果。从某种程度上说,上述问题均反映了伊朗国家体制的“冗政”特性,这其实也是伊朗行政体制的弊端所在。

3.4 伊朗情报系统信号情报能力依旧有限 总体上说,信号情报主要包括任何电磁频谱收集的情报。信号情报从通信、雷达和武器系统相关的传输中获得情报,它有力地补充了其他形式情报搜集渠道的缺陷^[18]。一般来说,情报系统信号能力“SIGINT”由三个条件组成,分别是通信情报,从无线电或电话等通信工具中获得情报;电子情报,从非通信发射器(如雷达)获取情报;域外仪器信号来自域外遥测信号,如卫星等尖端设备。此外,最新要素还可包括计算机网络开发等,它指的是利用互联网获取有价值的情报信息^[19]。迄今为止,伊朗的信号情报能力依旧相对有限。从获取的开源情报分析,伊朗情报系统信号情报能力进步速度比较缓慢。为扩大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2006年,伊朗在戈兰高地与叙利亚政府合作增设了两个情报信号收集站。这些情报信号收集站均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暗中资助与运营,主要用于向黎巴嫩真主党提供有力的情报支持。但这些情报信号收集站在后期运营时往往面临缺乏资金支持的窘境,目前已开始陷入停滞。伊斯兰革命卫队具有派遣无人侦察机收集情报的能力,但相对而言技术依旧不够先进,存在一定安全风险。革命卫队还可通过网络防御部队和电信公司监视网民在互联网之上的一切可疑信息。但相比以色列,

伊朗的信号情报技术较为落后,人才贮备能力和设备水平还需进一步提高。

4 解决伊朗情报体系困境的出路

至今,中东地区的战火、冲突与各国间的情报战从没有停歇。近年来,美国、以色列、沙特等国的情报系统对伊朗展开的攻击也愈加频繁,该国情报体系的承受能力当下正面临着重大考验。伊朗情报体系需依据外部形势及时进行调整,不断探索出路,才能应付各类风险和挑

4.1 平衡不同情报力量间的关系 伊朗情报系统需仗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力量开展工作,情报安全部的声音日渐下降,亟待改变现状。目前,伊朗情报系统的任务主要集中于防范外部敌人的隐蔽行动、反恐维和行动和镇压内部骚乱这三个方面。为平衡这两支情报力量之间的关系,伊朗情报系统需审慎地借鉴吸纳英美等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伊朗最高决策层需要在反情报方面、信号情报技术、技术情报、人力资源等领域给与情报安全部给与适当政策支持,让其更加积极地发挥作用。促使情报安全部在搜集地区情报领域能够发挥传统优势,与圣城旅相互配合捍卫伊朗什叶派军事网络的稳固,加强与地区盟友的联系,巩固伊朗伊斯兰政权稳定。

4.2 加强情报搜集能力和反情报系统建设 通常来讲,情报搜集手段分为公开来源情报搜集、人力情报和技术情报三大类。伊朗的公开来源情报搜集能力相对优秀,能凭借获取的公开各类信息捍卫伊朗国家安全。互联网时代下,伊朗可通过移动设备、社交媒体和先进的黑客技术窃取敌方重要情报。近年来,伊朗在国内已组建“Fire”和“Crowdstrike”等网络安全小组专门用于对外获取情报信息,已具一定成效^[20]。美国有关方面对此十分关注,频频筑牢网络防火墙防止黑客技术渗透^[21]。人力情报搜集方面,伊朗主要依赖圣城旅、外交人员和民间调查员等人员秘密搜集情报。在技术情报搜集能力方面,为提高伊朗情报搜集能力,该国着力在网络空间方面实现重大突破。2010年伊朗已成立网络空间防御司令部,用以应对来自美国等西方大国的网络攻击。2012年,伊朗网络部队成功抵御了震网(Stuxnet)攻击。美国众议院委员会在2014年外交事务报告中认为伊朗已从世界第二梯队网络技术能力跃升至一流国家之列^[22]。当然这种说法也存在迷惑对手的可能性。在社交软件和移动设备方面,伊朗积极构建监控系统实现对网络环境的“净化”。2018年伊朗政府已发射卫星收集器用于情报信息收集工作。尽管相比以美英等发达国家以图像、电子、导弹预警系统和核爆炸监测系统构成的立体侦查系统仍

有较大差距,但伊朗卫星也已经具备一定图像侦查能力。另外,伊朗信号情报搜集能力近年来也有所发展,已通过阿巴斯港附近的海底光纤电缆获取部分通信数据。不过,受限于宗教背景、技术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限制,伊朗很难短期内实现情报能力搜集水平的跨越式进步,无法与美国为代表的“五眼联盟”、俄罗斯、以色列等国相匹敌。

伊朗反情报系统方面目前依旧面临很多困境难以在短期内克服。从反情报的主体分析,情报安全部已经着手在降低国内安全风险方面做出努力,但在应对其国内少数族裔方面仍有较大困难。这主要指对俾路支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阿富汗难民等群体的管控措施存在力度不到位的问题。在对国内社交媒体监管方面也存在漏洞,如存在反情报技术能力不足和覆盖面不健全等问题。

瑕不掩瑜,伊朗在反情报系统方面也不断取得新进展。早在1990年,伊朗方面已成立先知之家(Household of the Prophet)组织,用于作为促进传播伊朗国家影响力的重要抓手。该组织宗旨是促进非伊朗国籍的“海外人士”与伊朗国家之间的联系。2015年,伊朗在首都德黑兰召开了大约有1800余人规模的大型集会,这也是该组织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会议。先知之家组织为获取敌方情报,监视敌对国家情报组织官员贡献了重要力量,对捍卫伊朗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23]。此外,武装力量在反情报系统建设方面也逐步步入正轨,情报人员素养逐渐稳步提高。在此,可借用伊朗古达叙事文学大师的话来对伊朗反情报系统进行评价,“伊朗有反情报系统,另一方面也没有反间谍机构。在这里,只有真主安拉。”言下之意,在伊朗国内,一切必须掌握在真主安拉手中,宗教的影响力不可低估。遍布于伊朗境内的各类安全矩阵(社会各类基层单位)宽大而深厚,在社会组织中呈现不同程度的密度分布。例如遍布伊朗境内的各类清真寺数量已达到3.5万座,主持清真寺工作的教士就是捍卫伊朗政权稳定的重要基层成员。

4.3 构建情报文化实现良性发展 情报文化是影响情报工作的关键因素之一,伊朗的情报实践曾塑造了该国的情报文化,当然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现实的情报工作。情报人员会不自觉地从以往的情报活动中找寻有益经验,借鉴以往的工作模式。单就情报认知水平而言,不同的国度有不同的情报认知,而底蕴和根基是本国的思想文化。这种思想文化一般会对情报工作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就伊朗而论,什叶派宗教文化中是其文化核心,独特的悲情殉难文化和“塔基亚”原则^[22]决定了该国民众对情报工作是较为支持的立场。伊朗外部安全环境常年面临巨大压力,这也就决

定了伊朗国家的情报文化不能保持“守成”局面,必须对外采取积极进取态度。近年来,伴随中东局势的演变过程,伊朗的国家影响力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上升,这背后与该国情报人员的默默努力有密切关系。当下,伊朗民间厚重的“告密文化”正日渐形成,对该国情报工作的开展也带来各类复杂影响^[18]。此外,情报人员对少数族群、“双重国籍”和个别政治团体的监视活动也在不断增加。国际媒体爆出的负面新闻也正在影响伊朗的国家形象。

当下,伊朗社会内部对于捍卫政权稳定的共识已初步形成,这对于开展情报工作具有积极影响。深受什叶派宗教观念影响的伊朗民众也愿意积极主动为国家奉献,甘于牺牲小我利益。除此之外,如果不向陈腐的体制弊端开刀,伊朗的情报强国之路也注定不会一帆风顺。总之,伊朗情报体系的发展困境与国家所处环境、发展阶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克服伊朗情报系统的各种疏漏不足需要依靠伊朗统治精英团体和全体人民的集体政治智慧与时间才行。

参 考 文 献

- [1] Carl A W. Iranian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 Intelligence*, 1997, 10(3): 288.
- [2] Richardo M. The Iranian intelligence services through the lenses of the institutional and bureaucratic models[EB/OL]. [2021-03-10]. <https://www.academia.edu/34863648>.
- [3] Kevjn L.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making in Iran[J]. *Comparative Strategy*, 2015, 34(5): 151-155.
- [4] Carl A W. Iranian intelligence establishment[J]. *The Intelligence Journal of U. S. Intelligence Studies*, 2015, 21(2): 63-66.
- [5] Saeid G. Captive society: The Basij militia and social control in Iran[M]. New York: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50-51.
- [6] Afshon O. Iran's Basij: membership in a militant islamist organization[J]. *Middle East Journal*, 2013, 67(3): 353-356.
- [7] Udit B. Revolutionary intelligence: The expanding intelligence role of the Iranian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J]. *Journal of Strategic Security*, 2015, 3(8): 102-105.
- [8] Michael W. Al Qods force: Iran's weapon of choice to export terrorism[J].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 Terrorism*, 2015, 10(2): 160-162.
- [9] 穆宏燕. 权力结构与权力制衡: 反思伊斯兰革命[J]. *西亚非洲*, 2019(1): 42.
- [10] Raz Z. The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 of the IRGC: a major Iranian intelligence apparatus[EB/OL]. [2021-03-10]. https://www.terrorism-info.org.il/app/uploads/2020/11/E_269_20.pdf.
- [11] Saeid G. The evolution's of Iran police forces and social control in the Islamic Republic[J], *Middle East Brief*, 2018, 120: 1-

8.

- [12] Ariane M T. Other side of the Iranian coin; Iran's counterterrorism apparatus[J].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018, 41(2): 196-197.
- [13] Daniel B. Iran and the emergenc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he evolution of revolution? [J].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4, 68(1): 25.
- [14] Carl A W. Iranian counterintellige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2019, 32(2): 282-285.
- [15] Udit B. Revolutionary intelligence; The expanding intelligence role of the Iranian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J]. *Journal of Strategic Security*, 2015, 3(8): 102-104.
- [16] Library of Congress. Iran's ministry of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a profile [EB/OL]. [2021-08-11]. <https://irp.fas.org/world/iran/mois-loc.pdf>.
- [17] 理查德·H·霍尔. 组织结构、过程及结果[M]. 张友星, 刘五一, 沈勇译.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284. .
- [18] Gawdat B, Anoushiravan E. Iran's defense strategy: the navy, ballistic missiles and cyberspace[J]. *Middle East Policy*, 2017, 24(3): 31-35.
- [19] Kevjn L.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making in Iran [J]. *Comparative Strategy*, 2015, 34(2): 151-155.
- [20] King Faisal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Islamic Studies. Iran's cyberattacks capabilities [EB/OL]. [2022-03-11] <http://www.kfcris.com/pdf/50781c86a6f571af0edb0189aa7594d75e2d6570cfa06.pdf>.
- [21] Mehran K. Iranian national-security debates; factionalism and lost opportunities [J]. *Middle East Policy*, 2007, XIV(2): 86-89.
- [22] 高金虎. 试论情报文化对情报工作的影响[J].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2010. (4): 77.
- [23] 王宇洁. 伊朗伊斯兰教史[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 27.